

编者按：胡德海先生是我国著名教育学家，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作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学术顾问、甘肃省教育学会前任理事长，胡先生一直关心本刊发展，自创刊至今多次赐稿，其中近年来就发表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教育学研究者要懂一点人类世界和宇宙》《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学习和研究哲学》《关于什么是儒家传统修养问题的学理解读》等文。近日，胡先生以98岁高龄，撰文回忆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经历，分享了他教育求学的体会。其间，先后经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系与北师大教育系合并这段重要史实，对我们了解新中国之初教育学提供了重要史料。本刊特发此文，以飨同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

胡德海

一、写在前面的话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读书的时间，是在1949年9月至1953年7月这四年。我在北师大上的是教育系，是此期间北师大教育系的一名在册学生。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是自幼入学读书，接受学校教育。由初小而高小，由初中而高中。我在高中毕业后，曾在家乡一所中学教过半年书。到北师大读书，是我继高中毕业后，接受的一段大学教育。而这也是我此生所经历的最后一段学生生涯。

所以，我和许多人一样，有多所母校，不止一所。不过，对我来说，在师大这四年，北师大这所母校和我以往的几所母校比较起来，情况是大不一样的。主要的不同之处有以下三点。

一是以往接受的都属于中小学阶段的普通教育，而在这里则是一种高等教育。两者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而高等教育都是专业教育，旨在培养某一方面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才，而这种专业教育实质上又是一种职业教育。像师大这种高等学校，它客观上所具有的职业性是尤为明显的。许多北师大毕业生和我此生所从事的教师职业的身份印记，就是由师大这所母校给打下的。所以，在这里读书和在以往的母校读书，其性质也是不同的。

二是读书的时代不同了。此前我在小学、中学读书，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时期。而在师大这四年，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所以，我这一生，也和当年所有同校同届同班的同学一样，经历了1949年10月1日前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而这前后两个时代的对接和交替，又因缘际会，恰巧发生在我们这届大学生上大学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这也可以说是我和我们这届大学生所遭逢的一个时代特点。这个时代特点的情况，具体讲是这样的：就以我来说，当我来到北京这座城市，进入师大校门时，虽说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和平解放了北京，已经接管和控制了这里的各个方面，但此时的北京，并不叫北京，而叫北平。北师

作者简介：胡德海，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学术顾问（兰州 730070）。

大并不叫北师大，而叫北平师范大学。年号仍称民国三十八年。把北平师范大学改称为北京师范大学，把民国三十八年改称为1949年，那都是在此年10月1日起才有的事。也就是说，那是我来到北京十来天之后才发生的事。

为了证明我上面说到的这个情况，我这里引述我的同学顾明远在其著作《如梦集——顾明远随笔》一书中的一段话来作佐证。因为顾明远不仅是我的同班同学，而且我们两人都是同年同月在上海这个考区参加考试，同被北师大录取；又于同月同日坐同一列火车由上海北站始发，于同日同时到了北京前门火车站这个终点站下车，然后一起步入北京和平门外的北师大校门，在师大又在同一时间办理了入学注册手续；被安排住在同一座宿舍楼，继之又坐在同一个教室内一起上课。他在该书首页《在老师大的生活》这一节中这样写道：1949年8月，从上海坐了53个小时火车到北平，到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教育系报到，学号为三八〇九四四。什么是“三八”？指的是入学的年份。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用的是民国纪元（民国三十八年）。^①

总之，他的这段话可以用来作佐证，正是因为他与我的这段经历是一样的。只是他比我细心，留下了当年入学注册时这个“三八〇九四四”的学号，而我的这些证件早就丢失得无影无踪了。另外，他还告诉我们这趟火车行驶了53个小时这个确切的时间。而我忆及当年情形时，只朦胧地觉得路上走的时间很长，却无“53”这个具体数字概念。

不仅如此，明远的这段话，我以为，还可以从时间上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这届大学生与别届不同，遭遇了风云变幻、改朝换代并置身于两个时代变迁、交替的关键时刻，于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典礼。我们亲历了、见证了国家名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年号变更等足称沧桑巨变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而我们这届大学生也就自然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三是读书生活的环境、条件都改变了。此前我从入读初小开始到高中毕业，都在本村、本镇、本县这个范围之内，交往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说的都是方言土语和当地官话。这次不同了，背井离乡，负笈数千里，从南到北，到了一个从未到过、语言和生活习惯以及山川地貌都迥然不同的地方。初来乍到，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所见所闻和接触的人和事，一时在心理上生发出来的反应和感受是显然的，也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来说，精神是亢奋和愉悦的。因为，北京到底是个早已耳熟能详的大地方，是个早已心仪已久、心向往之的所在，能到北师大读书也是出于自己选择和愿望实现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对客观的人和事，不仅抱有激赏、新奇的心态，也有大开了眼界的感觉。比如，当火车临近北京城，我从车窗往外眺望到的那长长的巍峨壮观的城墙，一种象征古香古色和悠长文化气息的古都风貌，顷刻就扑面而来，注入了我的心间，映现在我的心头，令我惊叹震撼不已，留下了最美好的印象。其映入并注入了头脑中的记忆，让我至今深刻难忘。我到北师大前从未见过，更未吃过的诸如饺子、窝头、丝糕、贴饼等北方常见的食品和豆汁、大碗茶等饮料，也觉得别具风格、别有风味，而吃喝得津津有味。在南方，当然也有各种面食，但炸酱面，则是我在北京的前门大街才第一次听到、见到和尝到的美食。至于京腔京调、真正地道的北京话，更是初次听到，此前是闻所未闻的。

以上所述及的这三点不同之处，构成了我此后在北师大学习、生活四年间迥异于往昔的主色调，它在我以后的四年间都会不时地也清晰地显现出来。

不论从1949年的入学还是从1953年毕业离校的时间算起，对今天的我来说，都已是70多年前

^① 顾明远，如梦集：顾明远随笔[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3。

的事了，都是一种陈年往事了。我在这四年中所经历和感受到的种种，都已成为我不可复现的陈迹和历史。然而，我对自己就学的历史，并不漠然置之，因我的一生，除了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的经历，此前，均是从一所学校进入另一所学校求知、求学的历史。在学校读书，成为我此生存在的一个重要形式和生活内容，也是我生命中最可记忆的组成部分。出于对在知识文化上海我良多的母校及众位师长的感恩感激之情，我对当年曾就学的初中和高中这两所母校，都写有长篇记述和追忆的文章。我今天抱着以上所说的同样心情来写这篇题为《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追忆文字，也就是在做生命历史的文章，真正的是在“向后看”。总之，在我看来，写这样一类忆旧文字，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事。这不论对我的母校北师大，还是对我自身来说都是如此。

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联合起来，聚集起来，才能成为共同的记忆。因为不论哪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建而成的。对一个具体的学校来说，就学于其中的学生的有关记忆和记述，是最真实、最重要的记忆，也是最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资料。

而就个人来说，人的生命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由昨天到今天的流动过程。一个人的历史和人生便是这个过程中，牵连着今日生活的种种往事的积聚。总之，在我看来，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窗户，打开这个历史之窗，将现实置于其深远的背景之中，我们便拥有多重维度，从而现实的选择立即就会显现出其清晰的走向。

因为回忆或称记忆，从根本上来讲是相互联系，互为中介的二重反映。回忆不仅反映客体、客观的人和事，也同时反映回忆者自身，反映其置身于其中的方方面面的存在状况。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它蕴藏着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感情和体验。故而，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着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致、也最深刻的联系。

二、高考应试，集体北上，都在上海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从1946年起，南方、北方一些著名大学一年一度招收新生，都要在上海设立考点。各校都要把招生地点、时间、院系名称、招生名额、报考资格、考试科目等有关信息，以招生简章的形式早早地登载在主要报纸上，以昭告社会和广大的青年学子。这些，对江浙沪乃至全国的考生来说，都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切身事。所以，每年夏天，从各地来到上海报考应试的考生云集，到处都可看到前来报考的青年学生，这已成为上海街头一时很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化氛围和一道亮丽的教育景观。

1949年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就是在此年的7月下旬从家乡来到上海应考者中的一员。此年的北师大也在上海招生，我就是在上海报考了北师大，被北师大录取的一名新生。

我在上海逗留期间，报考了两所大学，一所是北京大学，选的是西语系；一所是北师大，选的是教育系。读大学就学英语，报考外语系，是我在初中读书时就想过的问题。报考北京大学则是在高中读书时立下的志向。而报考北师大，准备以后学教育、当教师，是我高中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了半年书期间，不仅想过而且希冀实现的一个人生目标。如果从意向的时间先后和从专业上来考虑，我的第一志愿是英语，第二志愿是教育。如果从学校方面来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北师大算是第二志愿。但此二者都属于我的志愿范围之内。

不幸的是，我在参加北大入学考试期间，患了疟疾。我考了两门之后，在第三次考试时，突然浑身发烧，大汗淋漓，手足乏力，右手也有些发抖，我立刻知道，我的疟疾病复发了。考场内走动的监考老师见此状况，走过来摸摸我的额头，轻声地对我说：“身体坚持不住，就不要勉强了。”为此，我就面临着并不甘心 and 能否坚持得住这样两难的选择。经过一番咬紧牙齿、努力挣扎之后，我

觉得实在支持不住，只得抱着万般无奈和十分遗憾的心情走出考场。多年前就想到北大读书和学英语夙愿，终因这个可恶可恨的疟疾在这最不该出现的关键时刻的出现与复发而成泡影。这不能不说真是命运对我的一次无情的捉弄。疟疾，俗称打摆子，是由疟蚊侵咬人的皮肤，给身体中的血液传入疟虫所致。这在南方夏天曾经是一种很常见的传染病。我在读初中时，得过不止一次，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害一次或两次。我在高中读书时，暑假在家中也害过一次，没有想到这次在上海应考期间竟然复发了，这恐怕与我这时为应付考试身体过于劳累、身心负担过重有关。

这种病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种人所共知的特效药叫奎宁，也叫金鸡纳霜。病人每天按时服药，两三天后，就会觉得药到病除，身体会显得轻松起来，自己就会觉得好了，实际上血液里的疟虫并没有被杀死，仍潜伏在人体内。每当吃了一些带腥味如鱼类等食物，或身体劳累时还会不时地发作。由于有此经验，我在参加北师大的入学考试时，是服了奎宁去应试的。我在北师大的考场内，虽然不发烧了，但由于此前发过烧，此时的精神是不济的，浑身还是感到乏力。我在应北师大之试的过程中，也是要咬紧牙关在坚持的，各科试卷都是尽力去提振自己的精气神，勉力地去完成的。想不到在健康状况如此不佳的情况下去应试所得的成绩还能符合北师大录取的分数线，使我不致名落孙山，使我在这个夏天没有白来一趟上海，不致被挡在大学校园的门外而无书可读，并终于得遂所愿，有机会顺利地进入大学读书。我也为此始终感激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感念我的母校北师大录取了我，收留了我。这又不能不说是命运对我的一次眷顾。

我从上海回到家中，已是 8 月下旬了。我从报纸上看到北师大录取的新生名单（当年各大学都要把招生录取的新生名单登报公示，时间在 8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此期间有先有后）和收到北师大给我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已是 9 月初的事。我在家大概待了十来天，又匆匆收拾行李箱笼再次离家赴沪。这时的上海对我来说，是到北京去的一个必经的中转站。这份通知书还告诉我，这次新生到北京去是一次由学校安排组织的集体行动。所以要求各新生先到上海某中学去报到登记，以便统计人数，统一办理购票手续。我看了这个通知后，觉得这对我们这些第一次出远门的人来说，省了许多事，有人去买票，路上有人关照，大大方便了我们这次北上旅行。

我到上海后，遵照通知要求首先到指定的某中学内报了名，登了记，缴了买火车票的款，并留下所带的大件行李，然后到时任杨树浦区（现杨浦区）国棉 19 厂工程师的伯父家住下，等候启程的通知。我在伯父家住了有六七天时间才离开上海北上的。具体哪一天启程，我现在已说不准确了，但说在 16 日、17 日是大致不错的。因为火车行驶了 53 个小时，而我们这趟火车到达北京的时间是在 9 月 19 日的下午，这点是确切无误的。因为当时我是每天记日记的，我把这些都曾记在我的日记里，以后翻阅过多次，有关记忆都清晰难忘。

我从国棉 19 厂伯父家出来，坐公交车到上海北站的时间是在下午五六点钟，这时我看到一起排队上车的学生，不止是北师大一个学校的新生，还有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学生。这使我想到，这趟火车几乎成了北京这几所大学所包的一趟专列。这是北京各校所共同采取的一次联合行动。各校的新生分别坐在不同的车厢内，而各校又分别把不同院系的新生比较集中地坐在一起。当然，这趟火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专列，因为这些学校在上海录取的学生仅数百人而已，不会超过千人，是坐不满一车的座位的。和我坐在一起的就是两位非属新生的乘客。一位是到上海来寻找他儿子的天津人，一位是这次到北大法学院报到的原国立英士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他告诉我，后来在金华办学的英士大学撤销了，大部分学生并入浙大继续学业。但因浙大没有法律系，所以把英大法律系的学生分派到北大法学院继续就读。因为英士大学原办学地址在金华且和我就读的金华中学挨得很近，我对这所大学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比较感兴趣，我对当年彼此交谈时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历历如

在目前。由于和坐在一起的这两位旅客彼此可以交谈，所以觉得旅途颇不寂寞。至于坐得稍远同车厢的其他人，明知是同一学校的新同学，但因无人介绍，也就无所接触和交流，故彼此并不相认。我和当时坐在同一车厢的同班同学如顾明远等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在上海北站集体上车，火车开动的的时间已是下午五六点，车经苏州时，天已黑了。沿途经过几个大站如无锡、常州等站时，都是在一片乌黑之中，听到从喇叭中传来无锡、常州的报站声中，才知行驶到了这些地方。火车到南京长江南岸的下关时，已是次日早晨六七点钟。我算了一下，从上海到下关，火车整整行驶了十二三个小时，而在下关因为要轮渡，又要停留一两个小时。在此期间，可以看到人们纷纷趁机下车，在月台上走动和购买食品的情景。我记得我就是在下关车站买了一些油条烧饼之类用作早餐的。

火车在浦口车站又要停留一两个小时，于是我们有机会下车走动走动，舒展一下筋骨，明远说这趟火车路上行驶了 53 个小时，是符合实际的。之所以时间长，中间轮渡费时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这是一趟慢车，每个小站都要停一两分钟，没有餐车，所以每在大小站停留时，都有成群结队的附近农民前来卖各种小吃食物，包子、面条、鸡蛋、各种水果，五花八门，品类繁多。我就是在此过程中，在山东地面上，第一次尝到十分可口、品质绝佳的梨和著名的德州扒鸡。

火车从浦口往北行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和广大的原野，它既让我感到中国土地的辽阔，也使我感到长江南北的自然景色是多么的不同，也使我觉得认识祖国的山川地貌，的确要像古人所说，不仅要读万卷书，还得走万里路才行。而此时的我，正是坐着火车在行万里路。但更让我情感上有所触动的是，相比之下，我们南方的那一片满目青葱绚丽的景色，是多么令人难以忘怀。这时，对于坐在火车上的我来说真是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想象丰富，以至于今天我还能回忆起来曾出现在我内心深处的这段情感涟漪和心理波澜。

火车抵达终点站北京前门火车站的时间是在 9 月 19 日下午三四点钟，这时各校新生纷纷下车在月台上排队，然后有人领着他们鱼贯出站，我随北师大的队伍出站后，首先看到的是那座巍峨雄伟、古朴典雅的前门城楼。在这座前门城楼周围，停着多辆来接学生的北大、清华和燕大的校车。正在这时，热情洋溢地前来车站迎接我们的北师大的老同学们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热情地和我们握手、问候，随即把我们的行李装在他们带来的架子车上，帮助我们拉着这些装满行李的架子车走在我们前头。我们就随着他们前行。

由前门火车站到和平门外北师大，大概步行二十多分钟可到。在校门口，我又见有一群老同学在等待我们的到来，热情地把我们引入早就安排好的临时住宿地点——一个宽敞的大教室，这个教室便是以后我们这个班上课的教室。于是从上海到北京，这趟行驶了 53 个小时的长途旅行，到此画上了句号。正是在这里和这时，大家各自开始有了一个床位，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而我的人生也就在此空间和时间条件下，迈出了新的一步，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初识北师大，初会北京城

北师大是我国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的领头雁、排头兵。北师大创建于 1902 年，至今已有 123 年的历史，北师大的校史要追溯到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

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国立大学，成立于 1898 年。后因庚子之役撤办，1902 年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一开始只成立了仕学馆与师范馆。成立于 1902 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起点，也是北师大这所著名学府的前身。

京师大学堂成立师范馆是一大创举。它是甲午之后志士仁人对中国师范教育长期思考所结出的

一个善果。人所共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重视教育。他们认为，维新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维新人才的培养，故归根结底，变法图强之本在兴学堂，在发展教育。不仅如此，他们还深切意识到要办学就要有教师，而师范教育又是整个教育的基础。1895年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批评洋务派办的学堂，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一无所成，究其原因，端在不懂得师范教育之重要，即“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同年，梁启超还专门写了《论师范》一文。文中指出，日本明治兴学，师范学校先行，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师范馆是京师大学堂的核心与基础。师范馆办学严谨，成效显著。它作为北师大的前身，实为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起点，其发凡起创，影响深远。由师范馆设立本身所彰显的教师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作用和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大趋势具有恒久的意义。

师范馆虽然前后只存在了7年时间，但它是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史上的开篇之作。不过，按规定，师范系统是附设在各学堂内的非独立的组织系统。

1908年5月，清政府决定将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其校址就是1949年9月19日下午我们这些从上海来京的新大学生踏入的母校北师大在和平门外的校本部校址。我从此在北师大所亲历的四年间的学习和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当时的北师大除了有这个校址，还有一处在宣武门内的石驸马大街。北师大文学院各系就在石驸马大街。教育学院和理学院各系和校本部均在和平门外。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师大合并后，原辅仁大学的校址就成为北师大的一部分，这个地方人称北校区。从此时起，学校行政部门就从和平门外搬到此新校区办公。这样，这时的北师大就有三个不同地址所组成的校址。

1949年我进校时，全校学生有1100多人。学校行政管理分校、院、系三级。校一级称校务委员会，担任这个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为国文系资深教授黎锦熙。下有文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三个学院。文学院下有国文、外文、历史三系。理学院下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各系。教育学院下有教育、保育、体育、音乐、美术等系。当时任教育学院院长一职的为教育系教授董渭川。

这三个学院各系的设置是和多年来国内中等学校课程设置与其名称情况相适应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是有的放矢，完全对口的。中学有国文这一科目，这里就有国文系之设，中学有英文这一科目，这里就有外语系，其他各系均如此。从中可使人清楚看到，北师大多年来为造就培养中等学校师资的办学宗旨和目标是十分明确和一贯的。

系和学院不同，系是实体单位，而学院则不是。譬如，各系均有办公室、资料室，学院并无办公室、资料室之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教师集体开会，议事与学习也均以系为单位。

1951年后，学院这一级被取消。改为校系二级管理体制。校务委员会主任改称校长。我就读时，担任北师大校长一职的先后有教育系教授林砺儒（1952年起任教育部副部长）和著名历史学家陈垣。

在学校行政管理体制中，有教务长一职之设，教务长统管全校教务工作。教务处下有注册组、课业组等。时任教务长为数学系教授傅种孙。

当时学校各行政单位办事人员都很少。我这里且举教务处下属的注册组的情况来说。时任注册组组长为教育系教授康绍言，无副职，下仅有4个办事人员，这4个人既要管全校学生的注册，学业成绩登记，还要负责全校各班上课时的点名。注册组人员精干、敬业，工作效率极高，成效显著。

就系这一级来说，办公室和资料室办事人员，也仅各一人而已。工作按部就班，井井有条，绝无人浮于事的情况。

从有关资料得知，北师大有教育系之设，始于1924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的主持者和负责人，开设过一些什么课程，有哪些较知名的教师和学生等，我因没有见过有关资料，故无所知。下面说及的教育系，只是我在此四年读书期间，所看到和所知道的一些有关情况。

我在北师大教育系读书时，任教育系主任一职的，先后有汪奠基、丁浩川和彭飞这三位先生。

1949年9月我进校时的系主任为汪奠基。一二个月后，从华北革大调来丁浩川任校党总支书记和副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汪奠基就卸任了。1952年后，系主任由从中国人民大学来北师大的彭飞接替。

我进校时，保育系和教育系一样，是个单设单位，都归属于教育学院。我记得时任保育系主任的，先是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后是关瑞梧。但从1952年起，保育系不再单独设系，并入了教育系，称为学前教育专业，或称学前教育组，简称学前组。而原来的教育系改为学校教育专业或称学校教育组，简称学校组。也就是说，此时的教育系是由这两个专业组成和有这两个专业之分的。

我在教育系就读时，前三年并无班主任之设，但到第四年时，有了班主任这一名称。

现在人们都知道，北师大的校址在北太平庄。但我就读时的北师大校址并不在北太平庄，而是在我上面说到的三个地方。在我的记忆里的母校，也主要在和平时门外。我一想起昔日在北师大读书时的种种情景，想到的人和事及活动场所，都是在这个地方。

和平门外的北师大校址，从其占地面积来说，的确不算大，不算宽敞，更不显富丽堂皇，格局并不宏大。但其内部设施，样样俱全。学习、生活所需，无一不备，且其结构有序，紧凑有致，布局合理，并无使人有局促不安之感。在我看来，正因为它的不够大，不够宽敞，在生活上反显得有一种给人带来方便的舒适感。比如从宿舍到食堂、教室、图书馆、礼堂、操场、医务室、洗澡间，都仅步行几分钟可到。所以我对这个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是适应的，是感到方便和舒适的。不仅如此，我对这个地方在北京所占据的地理位置，所处的方位地段，尤觉满意和方便。因为这个地方，从总体上来看，是北京地面上的中心所在，是北京市最可宝贵的黄金地带。

校门坐西朝东，一出校门朝北方向走不多远便是和平门，向南方向走10分钟不到便是琉璃厂。进和平门出六部口，也仅十几分钟，往西方向便是西长安街和西单，往东方向步行十来分钟就到天安门广场了。所以，从这里不论到西单、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东单，还是到前门大街这些地方都很方便，到琉璃厂就更方便了。

我做学生时，出门很少乘坐公共汽车，也不骑自行车，到城内任何一个地方，主要靠步行，我当时就是靠自己的两条腿，从和平门外这个地方出发，走到了所有我所要到的地方，基本走遍了诸多为人所共知的著名地段、公园、街道、名胜区域。因为当时在城墙内，北京的面积并不算太大。比如，从西单往北走到鲁迅故居，再往北稍走一段便是农田和荒野之地了，便不值得再往前走了。

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手头不宽裕固然是个原因，而主要还是要主动地去认识北京城，去探究一下这个我已置身于其间的所在，了解这个在我看来很值得去亲身触摸与感受的大环境。因为这样，我在街头便可以随意走动，徜徉其间。在走的同时可以东张西望，可以随心所欲地或走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多做一些观察，或走进某个商店看看其中的各种商品，或驻足某个大建筑物面前，端详它的招牌名称，或可与人打招呼，攀谈几句，打听某种情况，这是只有靠自己走路才能做到的。坐公共汽车主要是求个“快”字，想很快到达目的地，除此之外我说到的这些都做不到。当然，出城门、到颐和园、万牲园、西郊这些地方，那是非要坐车不可的。

我到北京后，首先要寻访的一个地方便是天安门广场。因为此前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

绍北京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文章中说，北京天安门广场面积很大，可以站 16 万人。这就使我很想到这个地方亲眼去看一看。当我到这个地方后，内心真的立刻有广阔、宏大的印象出现，感到的确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一个空旷的所在。

我心想，这个广场，何止容纳得下 16 万人，20 万也装得下，不过这时（1949 年 9 月下旬）我看到的天安门和后来人们所看到的就大不一样了。当时，这里和别处一样，全是一片裸露着的泥沙土地，其靠南一些地方还长着一片绿油油的青草，附近似乎还有一些积水，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种荒芜的样子。总之，一切照旧，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其实就我观览所及，当时北京城和其建筑物等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也如此，主要是厚重与古朴，而不是华丽和灵动。这种厚重与古朴在北京人待人接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便是其礼貌待人、和气温婉、真诚和善的心灵。而这种古朴与厚重，甚至有些陈旧，正透出文化积淀深厚和为其他地方所无的泱泱大国的古都风貌。这种风貌属于历史和时间，是一本文化积淀极其丰厚的历史大书。这不是人们偶一接触或短时间的观览所可认知的。

所以说，我虽然在北京读了四年书，在北京待了四年时间，但我对北京只能略有接触和略有所知而已。城墙以外的北京地面，我虽然也到过不少地方，先后停留过一些时日，但始终不熟。没有比较完整的印象。我对北京城只能算是个初会与初见。

四、教育系的课程、教师和教学

北师大是一所老校。北师大教育系也是一个老系。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国内一些著名教育学者、知名教授中曾先后在这个系担任过教师一职的人是很多的。北京一些高校的教授在其他学校兼任教学工作的情况更是习以为常，历来如此。如北京大学的邱椿先生、清华大学的周先庚先生多年来就一直在北师大教育系兼课。所以说，当时高校之间教师所具有的流动性是很显著的一个特点。

但是，任何一个学校，总还有一套比较稳定也比较齐全的人马，在一个学校、一个系任教二三十年者并不鲜见，更有终其一生就在一个学校服务者。

那么，在我入学时的北师大教育系，其教师状况是怎样的呢？其中又有哪些教师呢？现就我作为这个系一名学生所看到的有关情况，做如下介绍。

有为本系学生讲授“教育概论”的董渭川先生，有为本系学生讲授“哲学”和“形式逻辑”的汪奠基先生，有为本系学生讲授“中等教育”的林砺儒先生，有为本系学生讲授“教育统计与测验”的薛鸿志先生，有为本系学生讲授“西洋教育史”“中国教育史”和“教育心理学”的邱椿先生，有为本系学生讲授“教育行政”的陈友松先生，有为本系学生讲授“教育政策与法规”的丁浩川先生，有为本系学生讲授“教育学”的朱启贤先生，有为本系学生讲授“心理学”的朱智贤先生。我入校时，还没有两位朱先生。朱启贤先生是 1950 年后从美国回来任教的。朱智贤先生是在 1951 年后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调到北师大教育系的。还有一位陈震东先生，是在 1950 年后从美国回来在此任教的。

我说是“为本系学生”讲授，是因为教育系还有担任其他各系公共教育课程的教师，教育系在外系担任公共课的有多少人和他们的姓名等，我就不清楚了。故此处也无从叙述。

我上面所说的为本系学生授课的教师是否齐全也还不一定，有可能还有漏掉的和我所不知的。因为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学生而已，是不足以了解全系的总体情况的。这是需要在这里说明的。

写到这里，我要对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的有关情况作点辨别与纠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百年校庆”专辑上有一篇署名文章说：1952 年教育部的院系调

整，使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育系以及其他一些单位的一大批知名学者来到北师大，他们其中不少人在教育学原理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如来自北大的邱椿、陈友松，来自人大的王焕勋，来自辅仁大学的张怀，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瞿菊农等。

看了这段文字，别的我且不说，其中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北京大学教育系的并入和邱椿、陈友松等人来到北师大教育系，并不是在 1952 年的院系调整期间和之后，而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 1949 年 6 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被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调整合并到北师大教育系来了，1949 年 9 月我入读教育系时，便有邱、陈两位先生，他们就已是教育系的在册人员了。这是我亲自所见的事，也是可从北师大档案馆里查到的历史事实。

这篇文章还说：从 1947 年开始，陆续邀请苏联教育学家，如波波夫、崔可夫、卡尔波娃、普希金等来师大举行讲座。这段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试想，1947 年的北平和此时的北师大，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国时代，怎么有可能去邀请这些苏联学者前来讲学呢？据我所知，北师大最早来校讲学的苏联专家是卡尔波娃，她是一位学前教育专家，在保育系授课，时间在 1950—1951 年。这位女专家，个子很硕大，我在校园里见过她，但没有听过她讲课。

教育系由苏联专家来给学生上课，始自我们这个班。1952 年 5 月 1 日前，我们班从江西参加“土改”回校，此后，教育方面的课程就全由苏联专家来担任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52 年 5—7 月这三个月，为我们班上课的苏联专家有两位：一位是讲教育学的波波夫，一位是讲外国教育史的崔可夫。波波夫讲的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凯洛夫《教育学》一书的内容，崔可夫讲的基本上依据苏联米丁斯基《世界教育史》一书。

从 1952 年 9 月新学期开始，又由另一位苏联专家普希金来给我们上课。普希金给我们讲了两门课，一门是教育学，一门是心理学，这时讲课的地方不再是一个只坐几十个人的小教室，而是可以容纳得下几百人的大礼堂。听课的对象不只是我们一两个班的学生，而是还有全系教师和师范院校教育学教师进修班的如瞿葆奎、景时春、王逢贤等全体学员。甚至教育部的一些干部也来此听课。真是济济一堂，盛况空前，蔚为大观。我当时作为教育系的一个学生，都是亲见亲历。至今每一念及当时情况，仍历历如在目前，印象深刻难忘。故为尊重历史事实起见，写了以上有关文字，并请见谅是幸。

1952 年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是高校的一件大事。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教育系自此并入北师大教育系。北师大教育系的规模有所扩大。如从中国人民大学来的王焕勋、彭飞等，从燕京大学来的廖泰初、胡梦玉等，从辅仁大学来的瞿菊农、张怀、邵爽秋、杨成章等，都成为北师大教育系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但除人民大学来的彭飞担任了这里的系主任一职和王焕勋任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一职外，其余如瞿菊农、张怀、邵爽秋、廖泰初等，均未再担任教学工作。他们和我们一样坐在礼堂听专家讲课。苏联专家讲课，特别是普希金的讲课和原有老师讲课不一样。他每讲一课之后，必须还要组织课堂讨论这个后续环节。从辅仁大学过来的杨成章先生就曾是组织我班同学进行课堂讨论的两位主持者中的一位。听了普希金的课，要组织课堂讨论的有两门，一为教育学，一为心理学。主持我们班教育学课堂讨论的教师有两位，一是杨成章，一是夏聿德。主持我们班心理学课堂讨论的也有两位，一为伍棠棣，一为章志光。

所以，我当学生时，听到过从辅仁大学来的瞿菊农、张怀、邵爽秋等人的名字，却未听过他们的课，也未见过这几位先生的面。

下面，我把 1952 年前我们班有关课程安排和一些教师上课的情况作点介绍。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有这样几门课。

1. “教育概论” 任课教师：董渭川

2. “心理学” 任课教师：周先庚（清华大学）
3. “人体生理学” 任课教师：包桂潜（生物系教师）
4.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任课教师：侯外庐、马特
5. “俄语” 任课教师多位，姓名已不复记忆
6. “教育英语” 任课教师：黄淑范
7. “体育” 任课教师由体育系教师担任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有这样几门课。

1. “教育心理学” 任课教师：邱椿
2. “教育测验与统计” 任课教师：薛鸿志
3. “中等教育” 任课教师：林砺儒
4. “小学教材教法” 任课教师：王静（师大附小校长）
5. “社会教育” 任课教师：先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江陵，后由另一位教师接替，姓名已

记不住

6. “政治经济学” 任课教师：胡明
7. “公共俄语” 任课教师姓名已不复记忆

在第二学年有这样几门课。

1. “教育学” 任课教师：郭晋华（主要讲了教育、教养、教学三个概念）
2. “哲学史” 任课教师：汪奠基
3. “外国教育史” 任课教师：邱椿
4. “形式逻辑” 任课教师：汪奠基
5. “马列主义基础（即联共党史）” 任课教师：谢韬（中国人民大学）
6. “中共党史（亦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任课教师多位，主讲为丁浩川

第三学年第一学期有陈友松先生的“教育行政”和邱椿先生的“中国教育史”等课程。但因我们班不久离校参加中南区江西省内的“土改”运动，这两门课都仅讲了很少一部分。

我听了这些教师的课后，留在头脑中的印象主要有以下这些。

1. 林砺儒先生讲“中等教育”这门课，说中等教育多年来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学的文理分科问题。二是升学与就业问题。中学（主要指高中）是文理分科好，还是不分科好？二是中学这个阶段要照顾以后升学的学生，还是也要照顾以后不能升学的学生？不能升学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中学生升入大学总是少数，大多数学生是不能或不准备升学的，因此就牵扯中学的课程安排问题。这也是林砺儒先生多年来从事中学教育实践中所发现和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

2. 汪奠基先生讲“形式逻辑”时，他指定我们读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本小册子。在这本著作中，斯大林严厉批评了苏联著名语言学家马尔认为语言有阶级性和语言是上层建筑的观点。斯大林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不是一种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语言是自有人类以来就随人类一起产生和出现的。汪奠基先生要我们读斯大林的这本小册时说，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学问，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和载体。那么应该说，思维也是没有阶级性的，研究思维形式和规律的逻辑学也是没有阶级性的。他说，斯大林关于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也启示了一些教育学家。苏联有一本叫《苏维埃教育学》的杂志，就发表过一篇题目叫《教育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文章。这对1949年后人们一说到“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时，总是回答说“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来说，是思想和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这是我听了汪先生的课和

反复读了斯大林的这本小册子后，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

汪奠基先生的“形式逻辑”实际上仅讲了一部分，并没有讲完。不过他讲的这部分内容，如内涵与外延关系问题，什么叫逻辑学，为什么要学逻辑学和有关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等，给我的启发还是很大的。正因为受他的启发，我自学逻辑学，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从而使我对逻辑这门学问的学习十分关注，兴趣盎然并略有常识。

3. 四门政治课。我在北师大读书时，对学校开设的四门政治课，在思想上是很重视的，不仅认真听课，认真笔记，还读了不少有关参考书。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对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范畴部分，我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最多。我写了有二三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了我，马克思主义从宏观上把握世界的思路，对我有直接的影响。

4. 胡明先生讲的“政治经济学”也给了我很大的理论启迪。我认为胡明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在政治经济学、哲学等方面都有造诣，有不少著作，他的这些书我都读过。他的这些著作足可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总体的完整的认识 and 把握。不仅如此，他文字功底和俄语都很好，他后来曾任北师大俄语系系主任一职。我和我同班同学周炳荣、吴寿松等三人还曾到他在西单的寓所访问过他。在他家，他和我们三人聊了整整一个上午。

5. 谢韬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联共党史”的教师。我们班的联共党史就是他来师大讲授的。这门课也有课堂讨论这个环节。但教育系又派不出主持讨论课教师，结果让我这个时为这门课的课代表来主持，为此，我又得多看了一些有关书籍。

6. “教育英文”是一门选修课，任课教师为黄淑范。她选的教材为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英文版。一开始选这门的有二三十人，听了两次，许多人不再来了，最后只剩下我和李祥两人听课。我想，通过这门课，系统地、完整地把杜威的这本代表作读完，也是很有意义的学习，既可了解杜威这本著作的理论内涵，又可很好地学习英语。但这门课仅开了一学期，就不开了。以后教育系再也没有开过这类课程。

我在大学一年级时，曾和几位同学到石驸马大街北师大文学院的国文系听过几个月的李长之讲李白与杜甫的课和叶丁易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外文系何万福的俄语课。

7. 邱椿先生的“外国教育史”中讲到夸美纽斯时说，夸美纽斯也叫夸门斯基。这是我翻看其他一些外国教育史书时所看不到的。他还专门讲了“马恩的教育思想”和“列斯的教育思想”这两章。并印了这两章的讲义发给我们。他的这些内容都是他对马恩列斯著作作了认真阅读和寻章摘句的结果。他说他的教育心理学讲的是他给北大研究生讲课时的内容和讲稿。这门课自成体系，结构有序，内容充实，可以给人传授许多知识。他讲课语态平稳，表述清晰，很吸引人。但我始终未见过他这方面的著作。他的中国教育史方面的著作我是读到过的。

他给我们班开的“中国教育史”课是在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即1951年9月开始的这个学期。后来因为我们班赴江西参加“土改”，课就停了，只讲了不到一个月，仅三四次而已。陈友松先生的“教育行政”课也是这个情况。

8. 董渭川先生大学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20世纪20年代，他在南开中学教过国文。他的讲课思路清晰，条分缕析，有条不紊，讲课娓娓动听。听了董渭川先生的“教育概论”课，我从中获得不少教育方面的知识。如他讲到的诸如中国的扫盲问题、中国的小学教育问题、中国的师范教育问题，他对杨贤江教育思想、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介绍，以及他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教育方面内容的阐述等，对拓展我们的教育视野大有裨益。

董渭川先生学识渊博，思路清晰，口才也好，讲课娓娓动听。他后来参与并主持全校教育实习

计划的制订和实际的指导工作，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9. 陈友松先生的“教育行政”课，由于后来我们这个班离校参加“土改”，仅讲了一两次就没有再讲了。所以对这门课也就没有什么印象。但我与陈先生之间有所交往。1980年我在北师大听留美华裔学者胡昌度的“比较教育”课期间，首先去看望的老师就是陈友松先生。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也孑然一身，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还依然热情洋溢地为人补习英文。我和他久别重逢，说了许多话。他说他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和床上的被褥都是他的学生从国外给他寄来的。他情趣昂扬，溢于言表，令我感动，也令我难忘。他要我以后每星期天去他家一次。他说，教育系办公室每星期有人给他送一次外面给他的信，这些多是他以前的学生从国外寄来的，里面有用中文写的，也有用英文写的。他要我为他读读这些信。所以在京停留的三个月期间，我多次到过他家和他晤面。这样，陈先生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就比较深了。我读哈耶克的书时，知道哈耶克生于1899年，死于1992年，我立刻就想到我的这位老师与他一样，陈先生也生于1899年，终于1992年。总之，我每想起北师大读书时的老师，首先想到的是陈先生，我永远怀念他。

五、图书馆：我常依偎和埋首驻足之地

上面我把北师大教育系有关课程和教师教学的情况尽可能详尽地和按其原来的样子作了叙述和介绍。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学校，一个系，总要把安排好课程和教师的教学作为其办学的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对于一个就学于此的学生来说，课程教学也是其求知学习的一条主要渠道。

但是，我以为，这不是唯一的渠道，对于任何一个想在大学认真读点书，决心在这里对知识、文化作一番主动探索，积极去求知学习的大学生来说，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渠道，那便是图书馆。

不仅如此，根据我在北师大四年读书的经验和体会，图书馆这条渠道更为重要，更为根本也更为实际。我在图书馆里埋首捧读着，读得兴趣盎然、津津有味的那些书，常常使我觉得，正是这些才是我所真正需要的，也使我感到这些书给我在知识、文化、理论、思想上的享受与收获是无与伦比的。这些内涵充实、丰富和具有全面性、系统性、深刻性特点的书，常常使我为之由衷倾倒，深深服膺。所以，我在北师大读书时，最想去、最爱去、最常去的地方便是图书馆了，也常以在图书馆为乐、为安。我徜徉于各书架之间，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书令我应接不暇，我俨然就在知识文化的海洋里，尽情地畅游。逐渐地，我也就理性地认为，师大图书馆，实际上是北师大这所知识文化宝库和重镇的“心脏”“大脑”和“胸怀”。它无私地向每个前来求知的师大学子敞开其伟大的胸襟，热诚地去接待他们，周到地为他们服务，是传递给他们最多的知识文化的源泉，是一个真正可令人感激在心的慈善机构。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曾经这样说：如果有天堂，那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在我看来，北师大图书馆就是一座这样的文化殿堂。

毋庸讳言，我对北师大图书馆是由衷赞美和十分倾心的，我对北师大图书馆所怀抱这份真诚的心情，也得到北师大图书馆的首肯和回应。2002年是北师大百年校庆，北师大图书馆校庆办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早在2001年9月，也就是在百年校庆前一年就准备出一本题为《百年情结——“我与北师大图书馆”征文文集》征文于师大的校友们。这时，师大图书馆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学生，并向我征文。我收到北师大校庆办的来信后，迅即给负责寄信给我的茹海涛先生回了一封简短的信。这封信所表示的就是我在这里说及的这种对北师大图书馆的感激之情和倾心之意，信不长，文字不多，且把它转录在下面。

北师大图书馆校庆办茹海涛先生尊鉴：

我在今天接读了母校图书馆校庆办的来信，嘱围绕“百年情结——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为题写些有关回忆文章，甚觉亲切并至为感激。

母校明年将届百岁华诞，实在可喜可贺。作为北师大昔日的学生和校友，我们是在母校的怀抱里吃母校的乳汁长大的。而母校的图书馆是母校北师大身上很重要的一个奶头，昔日我从母校图书馆这个知识文化的奶头中吮吸到的乳汁很多，很甘甜，获取的养料也很丰富。所以每当我想到母校以知识文化对自己的哺育之恩，我不仅想到给我们上课的各位亲爱的师长，而且常常想起昔日我常依偎和埋首驻足之地——母校北师大图书馆（我那时在和平门外的母校图书馆），想到那些曾为我们这些学生做了周到、亲切服务的馆内各位师长。现在时间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了，我却至今还想得起那些朴实、热情、善良的面孔和他（她）们的言谈举止，并深深纪念着他（她）们。总之，母校图书馆在我的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我从中真是获益匪浅。大概正是这个缘故，我每有著作问世，总要先给母校图书馆寄送一册，以资纪念，也籍报答于万一。

我现在寄上个人简介一份，以资以后联系之便，专此顺颂时绥。

胡德海

2001年9月27日

那么，我在图书馆读了些什么书呢？有哪些具体的收获呢？

这个问题，现在已难以说清了。因为时间过去已经太久远了。但尽管如此，依然清晰难忘的一些方面的情况值得在这里作些叙述。

1. 在这里整理了我的一些课堂笔记，使之在内容上更显系统性、完整性，文字清晰明白，可读性强。尤其对苏联专家普希金讲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这两门课课堂笔记的梳理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不仅是梳理，还有补充。我把从图书馆里找到的一些有关材料补充进去。我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这些笔记可作为我以后走上工作岗位讲课的教材，二是我的一位提前毕业分配到内蒙古某师专的同学要我为他提供这样一份讲稿。他说他没有听完苏联专家普希金的课，而目前学校又要他给全校学生讲授教育学和心理学这两门课，他内心为此焦急不已。为应他的这个要求，我就在图书馆认真地做了这个工作。他告诉我，他就是用我的这份读书加课堂笔记完成了这项授课任务。所以，在图书馆整理笔记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印象深刻难忘。当然，这份笔记在我以后看来，是十分肤浅和不成熟的。这里说的是当时的情况。

2. 读完了12本《整风文献》。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的12本《整风文献》是1942年延安整风有关文献的汇编。我读了其中一册之后，对其文风的清新、新颖、别致，有耳目一新之感，对其中说到的内容也觉得值得一读，所以决心把这12本读完。这12本书弥补了我在这些方面常识的不足，对我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提升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对当年延安整风的情况也有了一个较清晰完整的印象。

3. 读了一本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出的一本书，也是较早的一本毛选。其中许多文字，在后来出的毛选中是看不到的。

4. 读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联共党史》。我之所以读这些政治文集和文字，主要由当时十分重视政治学习的客观环境所促成。我也有补课的心理，有补自己这方面知识不足的思想。另外，我也想对领导这个新政权所宗奉的指导思想有个比较清晰的理论上的认识，因此，我读这类小册子为数是很多的，进而读了一些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对教育方面的书，却读得不多，只读杨贤江的一本书。

5. 写了有关辩证法和诸范畴20万—30万字的读书笔记。

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之后，很认真地做过这方面的读书笔记。对于其中的辩证法和范畴方面的内容尤感兴趣，曾认真利用图书馆内的有关书籍做了 20 万—30 万字的读书笔记。当然，所谓读书笔记，主要是抄书，这说来做的也是一项笨功夫，却是初学者的一条必由之路。因为抄了一遍书上的东西之后，主观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其中到底经历了一番梳理和消化的过程。我的这份读书笔记曾经给我的两位同学丁之奇和吴寿松看过，很得这两位同学的肯定。

辩证法这个概念，我的体会，首先是观点，是理论，是辩证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的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即辩证论实际上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宇宙观。所以，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既研究世界整体，也研究世界整体的联系和发展规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世界观。

范畴，依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归纳后得出的基本概念。黑格尔的范畴理论就有诸如有、无、变，无限和有限，同一与差别，根据与条件，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全体与部分，内与外，可能与现实，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普遍、特殊、个别这些。我从接触这些知识理论之日起，就一直认为，懂得和弄通这些问题和知识，对一个读书人、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它对一个人厘清自己的思路，有着直接的意义。

学习哲学辩证法和范畴，就是要懂得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这便是一个做学问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个思维逻辑方面的问题。

大学本该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间的真、善、美的净土，是引领人们走向文明、走向智慧、走向幸福的灯塔，正是在这里，我渐渐掌握了自学，懂得了自学，懂得了读书在人的一生成长、生活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常想，生而为人，如果不懂得品尝读书之乐，真是人的天大遗憾。作为一名大学生，如果不懂得图书馆在其求知求学过程中占据着极端重要的作用，而真诚地去接近它、利用它，知道从中去汲取最可宝贵的知识、文化营养，他也就枉为一名大学生了。

在大学的学习，需要博览群书，又要独具慧眼，懂得取舍，不为书的内容所俘虏、所左右。要使一些真正的人类的精神财富能为我所用和为我所拥有，培养自己将大学所学的学科融会贯通，以自己在精神上不断成长充实起来，其核心是独立思考，具有分析和判断的能力。而这些又需要大量知识文化作养料，并从中得到理论、方法论和诸多范畴上的启示。

以上是我在北师大图书馆至今还清晰记得所读过书的一部分和若干粗浅的体会。其他一些细小的方面，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六、几件亲见亲历的事

热烈欢庆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场景过后，校园渐趋平静。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生活也就开始了。

这时，学校给每个新同学送了三个书签。一个上面写着列宁的话：“学习、学习、再学习。”一个上面写着毛泽东的话：“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另一个还是毛泽东的话，是毛泽东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所作开幕词中的一句话：“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随之，我们就被组织起来分小组进行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政治，学习时事。怎么学习？总的原则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说就是要联系自己的思想政治、历史实际，不是夸夸其谈、不着边际，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思想见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纪律，有要求，要严肃对待，不能自

由散漫。

刚开始，学习由四年级同学戴昊等来主持，主要内容是评助学金。先是学习了毛泽东的两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别了，司徒雷登》。会上，除了要求每个人谈谈自己对评助学金的思想认识外，还要结合自己家庭情况和个人历史作无保留的交代。为鼓励人们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打消任何顾虑，我就是在这样的会上第一次听到“竹筒倒豆子”这样生动形象的比喻话语的。

后来，小组会就由各组自己产生的小组长来主持，开会、学习也就成了大家的一种常规和习惯。学习氛围也就逐渐形成了。自此，同学们在会上发言，会后交流、交谈也就开始在政治层面，在意识形态范围进行。这时，我的耳朵里听得最多的就是“开会”“学习”“政治”“思想”“听报告”之类的名词术语。人们就被置身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过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之中。

从1950年起，社会上相继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三大运动。在文化教育界开展了“批《武训传》”运动。这些运动都大张旗鼓、有声有色、气氛热烈，搞得轰轰烈烈。这些运动都要求大学生积极参加，不能置身事外，要积极投入。比如，抗美援朝，我们不仅要学习有关社论、文件，听有关报告，还要到街头向市民做宣传、鼓动。不仅如此，大学生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参军到抗美援朝的第一线去。我们班就有好几位同学离开学校去参了军。于是，同学之间就有了积极与落后、态度端正与不端正的分别。先进与落后也就以人们对待运动的态度来区分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政治与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治就成为每个人很重要的生活内容。

我在本文前面文字中说到，我在北师大这所母校这四年和我以往的母校相比，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学习的环境和时代都变了，根本不同了。根本的不同点是什么呢？是讲态度、讲政治、讲思想、讲意识形态、讲立场、讲观点，而且是很讲政治、很讲思想、很讲立场和观点，是唯一，而不是唯二。

这种根本的不同点，用我的一位伯母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读共产党的书”。1949年9月中旬，我离沪北上时，送我上车的伯母在路上曾经无意间给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这次到北边去读书，要读共产党的书吧！”我根据后来在北师大读书学习的情况，想起伯母当年说的这句话，觉得她说的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是对人们将面临的生活环境很到位、很准确的一个预判。

什么是共产党的书？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共产党的书，“政治经济学”就是共产党的书，联共党史、中共党史都是共产党的书。图书馆里摆放的《整风文献》《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联共党史》和各类政治读物、有关文史哲的书籍等都是共产党的书。这些书里面所要告诉人们的都是共产党所崇奉的理论和思想。我们在课堂听老师讲的是这些有关教材，我们在小组里学习、讨论、谈体会、谈认识都离不开书上的这些内容，而各种政治运动，也就是这种思想和理论的具体化、实践化、实际化。所以，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书是一种学习，参加现实的政治运动也是一种学习。这都是主流意识所曾经反复教导和要我们懂得的道理。

我通过这样一种长期政治学习和现实政治生活的浸润熏陶，还真的体会到、认识到：政治这个东西，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客观存在。不管这个人在此学习过程中是自觉的也好，还是被迫的也好；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政治这个东西对一个社会的人，特别是有文化知识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来说，是必须要深切懂得的一个极重要的人生生活课题。它在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懂政治的人从根本来说是个糊涂人、头脑不清晰的人。一个人特别作为一个学者只有懂得了政治才能懂得古今中外的许多大事，对许多人和事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就有

了看待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评判的标准，说话做事才能有分寸，有主见，才有一个人应具有的内涵与素质。但是，懂得政治和是否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是两回事。而且学政治，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的学习都必须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不入乎其内，学不精到，只能自欺欺人；不出乎其外，别具慧眼，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就会被政治所吞噬，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在这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以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就是个既能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站得高，看得远，懂政治的范例。秦末汉初的张良也是一个既懂政治又懂人情人性的明白人、聪明人。因为政治到底还是政治家，也就是人来把控的一种工具。不懂得人性就不能真正认识各类政治家和其政治活动。

政治牵涉社会、世界和各类人的利益，懂政治需要具备各种社会历史文化知识，也需要广泛的正反两方面的阅历。这是一门人生的大学问，每个人就是在不断地和政治打交道，不断地和人的交往中，又在不断地学习认识和体悟的过程中去认识政治的。正是在这种综合的过程中，透出人的政治智慧、政治品质和政治水平。

上面所述，可视为是这部分内容的一个前言，说这些，旨在说明我在北师大读书生活四年期间所切实置身的客观环境和其所呈现的社会生态。下面所叙及的亲见亲历的几件事都与这种环境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分不开，仅是我这四年间所经历的一部分。

之一是在虎坊桥平民夜校当副校长、校长。

1949年10月学校开学上课不久，我所在的北师大教育系办公室秘书找到我，并对我说，教育系的学生多年来办有一所平民夜校，地点在虎坊桥小学。白天是虎坊桥小学的学生上课，晚上，我们这所平民夜校就在那里上课。这所平民夜校的学生有工人、店员，也有家庭妇女和七八岁、十来岁的少年儿童。平民夜校上的都是小学的课程，有语文、算术等，分初、中、高三个年级，每个年级有两班学生，学生有二三百人。教师一般由教育系的学生担任。办这样一所夜校，目的是让教育系的学生对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有所了解，增加点对教师职业的感性认识，这对以后各种教育课程的学习是有好处的。这位系秘书对我说了这么多话，最后说要我担任这个夜校的副校长，这是他来找我的目的所在。上面这些话，算是他对我所作的情况介绍。我想这是系里的委派，也是大家应尽的义务，所以就同意了。因为是副校长，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得到学校去看看，以尽我作为一名副校长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我也给学生上课，给小学生上过语文课，也上过算术课。

这个学校的校长，是比我高一级的岳广河同学，山东人，年纪大概已有三十多岁，人很老练，工作也很负责、认真。他说是他到系里让那位秘书找的我。很显然因为他是想脱身，才这么干的。所以一个学期后，我就当了这所夜校的校长。

当校长和当副校长不一样，要管学校全面的工作，要接待到夜校办事的各类人员，处理各种事务，如学生的报名、请假、请教师上课以及和虎坊桥小学校长的联系等事，也和前门区教育局局长、干部有了接触。原来这所夜校此时不仅教育系有人管，由于它办在前门区，办在他们管辖的虎坊桥这所小学内，所以连同夜校统算在他们应该管的业务范围之内，经常有几位工作人员过来和我们作些交流联系。记得我还曾到前门区教育局开过几次会，如此一来二往，和前门区教育局的一些干部就慢慢熟悉起来了，知道他们把我们办的这类夜校叫“群众教育”，也知道他们除了要管一些小学之外，还要管理刚刚创办的几所职工业余中学。由于当时他们正需要请教师到他们办的职工业余学校上课，我就同时应他们的约请，到办在北京大栅栏一条胡同内的某中学的职工业余学校教中学语文课，每周上课两次，每次两小时。这份教职有一定的报酬，我大概在那里教了一年半。

虎坊桥平民夜校的事，由于后来参加“土改”离校，也就从此没有再管过。

之二是到江西参加“土改”运动。

1951年9月，新学年开始，这时我们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大概上了不到一个月的课，我们这个班被通知要下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这是早在1950年就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次搞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震动全社会的大运动，其规模声势之大，史无前例。对这些，我们早已在报纸、电影、有关报告等宣传品中，深深地领略到。学校里早已有多批教师到农村去参加“土改”。他们回学校后，给大家作有关报告，我们在大礼堂也不止一次听过。现在我们竟也有机会去参加全国最后一轮也是规模最大的“土改”运动。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心情是十分振奋、热烈和期待的。

参加这次“土改”的有中文、教育、外文、历史、音乐这几个系三四年级的学生，有一二百人。大家被编为全国政协“土改”第13团，团长为中文系一个姓寇的同学，副团长为我班同学王树棠。这次是以全国政协的名义组团下去的，各民主党派的成员、许多高校的学生，他们这次参加的“土改”，举的就是全国政协的旗号，各团都有印有全国政协文字和符号的团旗。

这次全国政协组织了多少个团，我现在已说不清了，估计有几十个，人数在上万左右。因为参加这次“土改”的各团成员都要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个露天剧场内一起听有关报告。那个有一万多个座位的露天剧场都坐得满满的。

下去之前，我们每天都要整队到这个地方去听有关报告，先后时间总有十来天之久。

为我们这些准备下去的干部和学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露天剧场作过报告的有多位，印象较深的有这样三个人。一个是时任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从1950年起就负责指导北京郊区各县“土改”工作的柴泽民。有关土地改革工作过程中要贯彻的各项方针政策，就是由他来宣讲。他先后讲了四五次。一个是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他在会上主要讲自己当县委书记时，下去参加“土改”的经验和体会。这些报告都讲得很细，很具体，也讲得很动听。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学生听了之后，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有大开眼界之感。在最后一次会上，代表全国政协对大家表示送别之意的是时任国家人事部部长的安子文。

在这次会上，有关工作人员在大会上安排了生活方面的事，其周到、具体与细致，我至今记忆犹新，其场景、其画面仍历历如在目前。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得知这次下去的人均伙食按中灶待遇。

起先，说我们这个团是到四川去，后来又说要到湖南去。结果是到时属中南区的江西省。一日，我们从北京上车出发，途经平原、河南，直到中南局所在地湖北的武汉汉口一所学校内住下。在那里又停留了几天，听了一些有关“土改”的报告。其间，管中南区“土改”工作的杜润生所作的一次报告，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在此期间，我们被安排到江西。于是，我们从汉口到了江西南昌，在南昌又停留了几天，听了一些介绍江西情况和有关“土改”政策的报告。在此过程中，负责全省“土改”工作、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刘俊秀为我们作过多次报告，给我留下的记忆最深。到江西去的除我们这个团外，还有北大的师生组成的第12团。我们这个团被安排到属于老革命根据地宁都地区的兴国和于都这两个县。我们这个团，有的到兴国县，有的在于都。我们教育系就在于都的各区乡。我被分在于都县城关区上孟乡。和我在同一乡的同班同学还有周玉田和张庆年。周玉田就留在乡政府所在的一个村内，我被分派到离乡政府约有七八里地的一个叫古樟村的地方。张庆年在比我稍远的大平村内，这就是我们参加“土改”最终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是“土改”的第一线。

古樟村和附近其他的一些村落一样，处于一片绵延起伏的群山包围之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村。只是这个村的背后，有一座高高地耸立着像屏障的山峰，因此而得名，全村共60户。除我外，还有一个姓邱和一个姓严的两位当地干部，我们三人主持负责这个村的“土改”工作。三个人都能

互相配合、按部就班地在这里完成了上面所要求的工作任务。

我们在那里居住了五个多月，于1952年4月底，离开这个村和于都县，于5月1日前从南昌乘坐浙赣线和沪杭线的火车经上海返回北京校内。

之三是遭遇了晴天霹雳、无妄之灾。

1952年五六月间，地点是在北京和平门外的北京师范大学。那时，我是北师大三年级的学生，刚和全班同学一起从江西于都县参加完那里的“土改”运动回到学校。不久，学校开展了一次“忠诚老实运动”，全校师生一起开会，听动员报告，然后分系分班开会进行个人坦白交代。这个运动号召大家自觉地、忠诚老实地向组织交代清楚自己的政治历史。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班的同学在一间教室里开会。会上我听到一些同学说“我参加过三青团”“我参加过一贯道”之类坦白交代的发言。主持我们班此会的是一位女同学。她在会上问我有没有需要向组织交代的话。我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没有需要向组织交代的问题。开完会大家也就散了。后来，这位主持会议的女同学告诉我，有份检举我的材料，不过她说，你既然说没有参加过，那就算了，不必在意，我是相信你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事，不了解政治历史问题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来说，具有何种重要的性质与意义。后来，通过几件事，才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那份检举材料已经使我从此遇到了大麻烦。这对我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无妄之灾。我上文曾说到1949年夏，在上海参加高考时，在考北大的考场内因突然害了疟疾，致不能终卷，终于中途离开试场的事，说这是命运对我的一次捉弄。那么，这份检举信就是命运对我一次更大的捉弄了。我以后所遭遇的至暗岁月不仅与此有关，而且这是我后来所遭遇种种不堪回首情况的诱因与先导，以至我在今天来写这篇忆旧文字时，都不能不留下这铭心刻骨和极其沉重的一笔。

七、篇后余言

这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写到这里，就可告结束了。但似还有几句话要说，此亦即所谓篇后余言也。

语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的多所母校都是我人生旅途中所经历、停留、歇脚的驿站。我这里要说的是，北师大这所母校和我的其他几所母校一样，并没有因时间的久远而忘却了我这个当年的停留者、歇脚者。在一本定名为《北师大的校友们》一书中第三编“校友风采”内就有以《胡德海：游书海著书千言，育桃李终生无悔》为题，作为该书的一个篇章，对我作了报道，这是我这里需要提及和表示由衷感谢的一点。

另外，在此四年中，仍留在我记忆中的诸同学如顾明远、丁之奇、吴寿松、周炳荣、雷文娴、农绍康、苏曼嫦等，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留下他们的名字，以表示我对他们的永远怀念和纪念之意。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友谊，在人的生命过程中，毕竟是至可珍视和最为宝贵的东西。

最后，还要把我的两首诗附录在这里，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述 怀

人生天地间，诸事不可少。
衣食固其端，精神尤重要。
前者关存在，后则定高下。
生命有情爱，草木欣春夏。

忆 往

世事沧桑近百年，舞台即在我眼前。
观之的似一场梦，万确千真古人言。
是非曲直终须有，热血良知贯心间。
兼程风雨诚非易，无悔人生无愧天。

（责任编辑 曹周天）